



北美汉学家 Kirk Denton (邓腾克) 访谈录

王桂妹 罗 靚(译)

我于 2010 年 12 月来到北美访学,结识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 Kirk Denton(邓腾克)教授。他是当下美国学界现当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我对邓腾克教授作了一次学术访谈,就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向他提了很多问题。事后,邓腾克教授对访谈所涉及的问题,又作了认真的文字答复,由肯塔基大学罗靚教授翻译成中文。我觉得这样的访谈,可以促进我们对西方学者的感性了解,是读学术专著之外的有益补充,值得在国内发表出来。现在呈献给读者的就是整理后的访谈录。

王桂妹(以下简称王):Kirk Denton 先生,非常荣幸能在美国采访到您,也感谢您和中國大陸学术界分享您的研究成就和研究心得。能否请您首先介绍一下您的学术历程?

Kirk Denton(中文名邓腾克,以下简称邓):好的。我大学学的是法语专业。1978 年毕业时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好在芝加哥附近一家家具厂组装运送家具。尽管那一年多时间为我的人生提供了一次宝贵经历,但它根本无法满足我的诉求。正好那时正是中美邦交开始走向正常化的时期,新闻里都是中国,我对此深感好奇,决定到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学习中文。我在 15 个月内修完了三年的中文课程,并于 1980 年秋季学期作为文革以来第一批美国学生之一,开始在复旦大学学习。那是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尽管我曾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University of Grenoble)留过一年学,暑假也在法国 Brittany 和瑞士呆过,但我从没到过非西方国家,也没到过社会主义国家。在上海学习一年后(其间我去过昆明,并早在三峡大坝建成前就顺长江而下,另外还去了北京和苏州)。我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决定报考博士研究生。还在上海期间,我就报考了多伦多大学(我出生在多伦多,又在那儿度过了最初的 10 年,现在我还是以它为“家”),我被录取了。1982 年我完成了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硕士学位,并于 1988 年完成了在多伦多大学的博士学位。我的硕士论文是对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符号学”解读。

在多伦多大学学习期间,我读到夏志清教授所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有关路翎的一段话,印象很深,因为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当时我的兴趣主要还是文学性的——我了解路翎对主人公“心理”世界的独特观照,这一视角与我读过的几乎所有其他中国小说(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似乎都大有不同。我最初想从文化视角探究这类小说在中国相对少见的原因,尽管文化的因素是重要的,但我最终认识到关注主人公内心生活的小说被压制也有政治因素。也就是说,它与毛时代教化式的文学模式将其界定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学大有关联。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欣赏的都是现代中国小说的政治性。我知道在“后毛时代”,中国的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对此大为不满,认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不过是政治宣传,但现代中国文学中最好的作品正是具有宏大政治性的作品,这种政治性不是狭义的,而是试图探究具有政治隐喻的社会、文化和道德问题。这对我而言非常新鲜,因为我所接受的教育强

调对相对非政治性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经典的读解。当我发现有种文学曾经起过作用——人们真正去读它、讨论它,而且它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这对我来说是新的体验(或许我和其他汉学家一样,因为中国具有我自己社会中没有的因素而被吸引)。

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鲁迅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而自20世纪末,“贬鲁迅”、“骂鲁迅”也一度成为风潮和时髦,并引起了论争。您作为中国学专家,也专门做过关于鲁迅的研究,并在俄亥俄大学和哈佛大学开设了鲁迅专题课,请您谈谈您是怎样看待鲁迅和中国文化精神关系的?

邓: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内外诸如朱大可、王朔、冯骥才等批判鲁迅的声音,我早有耳闻。这样的批判当然有历史原因,它与中国的激进政治遗产和“告别革命”的渴望相关。鲁迅的学者声誉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尤其是他曾在文革中被激进左派拥为标志性人物),当然会让人想把他从文学之神的高台上拉下几级台阶。将鲁迅“人化”是鲁迅研究中相当正面的发展趋势,但像这些批评家一样无视他的作品,却是不对的。我仍然十分推崇鲁迅的作品,因为它在语言和叙事方面试验创新的同时,又深切关注社会与文化问题;换句话说,它将审美观照与道德和社会诉求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尽管夏志清批评鲁迅写作中狭隘的“中国情结”,也就是他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的道德负担”,我却认为鲁迅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和散文诗——具有极为世界性的吸引力。我在教美国学生读《狂人日记》时,他们似乎能从自己无法逃离当代大众传媒和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经历中,很快感受到狂人所感受到的心灵束缚。就我看来,这与鲁迅的初衷相去不远。

我欣赏鲁迅之处在于:虽然他是一个“政治性”作家,而且有时极好论争,但在他最好的作品中却绝少持一端之见,而总是以对话的心态权衡(而不是武断地赞成或反对)道德与社会问题的各个方面。鲁迅以极为繁复而又并不教条的多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社会与道德问题的关注。他感兴趣的是希望与绝望、呐喊与沉默、受害人与迫害者之间的灰色地带。他的深刻反讽精神也深深吸引我,而且在我看来是极具现代性的。

王:我发现您在研究中一直对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比较关注,尤其是对文学和政治、文学家和特定时代文艺政策的关系(比如延安整风时期)有过专门研究,您有关胡风和路翎的专题研究大概也与此问题相关。文学家和政治的关系是中国学术界多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请您结合您的研究谈谈您的看法。

邓:我的确对知识分子及其社会政治职能很有兴趣,这也是我研究中一个持续的主题。某些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西方著作将政府和知识分子视为二元对立,我试图在研究中摒弃这种简单化的研究范式。尽管路翎和胡风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命运悲惨,但把他们视为共和国或毛时代政权的“异见者”或“反对者”却是不对的。我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问题自我》(*The Problematic of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中,曾经采用了“话语分析”方式来解构这种二元模式。事实上,在推动文学的社会改造力方面,胡风的文学观与梁启超、瞿秋白、毛泽东所代表的现代中国“主流”文学观相当接近。也就是说,胡风与毛泽东属于同一个“话语共同体”,他们在对文学功用问题上的想法有很多相通之处。在“后毛时代”学术研究中有将胡风等人浪漫化为“英勇抵抗者”的趋势,这种“再现”方式与毛时代将胡风视为“反革命”的再现方式同样是为政治所驱动的。

同时,我还希望透过马克思主义的表面去探究胡风(以及许多其他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与儒家传统的关联。我想要强调的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胡风与毛泽东)其实具有相似的世界观,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受有关知识分子职能与文学可以改变社会的传统观念影响。在我和Michel Hockx合作的有关中国民国时期文学社团(*Literary Societies in Republican China*)的研究中,我们试图展示文学知识分子是如何为在文学场域中发挥自身主体性的信念所驱动,也就是说,他们的动机常常既是文学性的,又是社会性的(是他们区别于其他知识分子的方式)。这一研究视角深受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影响。

王:您谈到在您的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一直关注“传统”是怎样进入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我还注意到您在俄亥俄大学开设的一些课程也都与您的这个思考相关,这也是中国近些年来国家和学界共同

关注的热点问题,请您谈谈您作为一个北美的汉学专家,是怎样看待这个已经纠结了中国一百多年的问题的?

邓:我的早期研究可被描述为“修正主义”式的,因为我试图重新展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问题。但我希望那并不是以本质论或宿命论的方式进行的,我想做的是让大家关注中国现代性发生过程中传统的持续性能量。就此而言,我的研究是对在学界具权威地位的五四模式的一种反思,这一激进打破偶像和从传统中解放的模式否认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价值的联系。比如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的导论中我就分析了中国从晚清到20世纪40年代对西方文学话语的接受。我所关注的是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整合性的描述,以此说明传统文化价值观及中国历史现状是如何对作家理解和描述西方文学模式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产生深刻影响的。这也是我对胡风“主观性”文学理论及其弟子路翎的“心理小说”进行分析时关注的问题。我认为在他们的作品中存在着相当传统的将自我与外在世界相连、并使自我积极主动投身历史转折期的渴望。在其心理小说中,路翎力图在被革命和民族抗争的“宏大叙事”占据的文学景观中植入私人与个体的因素。他塑造的知识分子是浪漫地视自己为抗争社会的孤独斗士的激进个人主义者。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同时又为“大众”所吸引,并将其认定为推动社会的某种神圣力量。中国现代文学对自我的再现在西方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话语与革命和民族抗争的集体主义话语之间摇摆,二者皆不能最终满足新儒家所谓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传统诉求。胡风与路翎因而折射出中国文化现代性复杂矛盾本质的一个方面。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问题自我》一书中,我写道:“我的初衷是从传统问题的角度来观照现代性。但这种观照不是理解现代在中国的意义,的终极批评方案,而是一种探求鲜活可能性的精神。”至今,我仍这样认为。

王:我在研读您著述的过程中,感觉您不但是一个“大中国”的研究视野——涉及到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各个地区,甚至还扩展到了整个东亚,同时您的学术研究也是一个“大文学”的概念,是一个囊括了语言、文学、电影、戏剧的系统综合研究,我权且称之为“大视野研究”,这与中国大陆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般状况有所不同,可否请您就您的具体研究门类谈谈您的“大视野”研究体会。

邓:在某种程度上说,西方的中国学家比在中国的学者研究范围更广泛驳杂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或许最重要的是西方与中国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制度性差异。在中国,中国研究专家一般在“中文系”,而在西方,我们通常是东亚语言文学系或“现代语言”甚至“世界文学”系的一部分。我所在的东亚语言文学系有五位中国文学专家。也就是说,五位学者要负责从《诗经》到当代网络文学的全部文学传统!尽管我们是北美最大的中国文学研究所之一,用中国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却小得可怜。在中国的大学里,一个典型中文系的学者数目是我们的三四倍,从而为研究者的专、精提供更大的可能性。当然,如果只有五个人,我们就不得不成为“杂家”,也不能不比中国的同事们教更广泛的课程。原因之二是“文化研究”理论的影响。这一理论促使文化等级观的解体以及文化范畴的扩展。而今“高雅”精英文化与“低俗”大众文化的传统分界不再有效,所有形式的文化都成为研究与教学的合理命题。北美的大学里又大力推崇“跨学科性”,鼓励教师在教学研究中跨学科。因此,尽管我的本行是中国现代文学,却经常给研究生开流行文化和电影课。我的流行文化课涉及电视、摇滚、杂志、广告、网站等。在我们的领域,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在教学研究中涉及其它艺术门类是相当普遍的,比如鲁晓鹏和张英进之于电影,唐小兵之于木刻,Yomi Braester之于都市文化。我仍然坚信学科的专、精是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跨越学科界限的游走当然也能带来新鲜有趣的视角。比如我在文学和叙事分析方面的训练赋予我一套特定技能来分析中国博物馆展览的“视觉修辞”。文学的训练使我从历史故事的角度去“阅读”博物馆展览,探究那些故事是如何被建构的,以及故事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

王:您主编的杂志“*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和您所主办的网站“[MCLC Resource Center](#)”目前已经成为美国乃至西方英语国家研究界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电影、艺术、音乐、文化的重要研究阵地、学术交流平台和资料信息库,包括您曾经主编的一些中国文化读物也几乎都成为西方学者了解中国文化的指南,您在现当代中国文化文学研究、推介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请您谈谈您主编这些杂志、丛书以及您主办这个网站的理念和心得。

邓:我于1998年从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手里接过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编之职。作为主编,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将其重新命名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并重新设计了杂志的编排与审美外观。改名是为了展示它的跨学科性,表明除了文学研究,我们还发表有关电影、流行文化、传媒研究、建筑、艺术等方面的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新名字也折射出“文化研究”这一跨学科趋势的影响,如我在谈上面第五个问题时提及的。与此同时,我希望通过新媒体来扩大期刊的影响力,将其发展为讨论与中国现代文化研究相关课题的论坛。因而我创建了MCLC资源中心和MCLC电子邮件组,前者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化的网站,它囊括了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品翻译、视觉艺术、教育等方面的详尽论文索引(其中绝大多数是英文)。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学者和学生的一种“资源”。在开展新的研究课题之前,他们可以参考这一书目以确保对现有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MCLC资源中心也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杂志提供了“上网”的空间。自2004年以来,我们把原来刊物上出版的书评移到了网上。至今我们已在以下网址发表了近90篇书评(<http://mclc.osu.edu/rc/reviews.htm>)。自2000年以来,我们还在网站上推出了一种“出版系列”。我们在此发表了通常不在印行刊物上发表的、或是更适于网上发表的作品,包括翻译、书目、访谈、视觉或多媒体效果强烈的文章等。比如我们发表了由荷兰学者Maghiel van Crevel编辑的有关中国先锋诗歌的书目(<http://mclc.osu.edu/rc/pubs/vancrevel3.html>);《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剧本(<http://mclc.osu.edu/rc/pubs/noble.htm>);丁西林《酒后》的剧本翻译和演出录像(<http://mclc.osu.edu/rc/pubs/ding.htm>);对《上海漫画》和新感觉派关系的分析文章(<http://mclc.osu.edu/rc/pubs/laing.htm>)以及最近发表的有关阎连科的新小说《四书》的分析(<http://mclc.osu.edu/rc/pubs/tsai2.htm>)。

《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杂志与网站还承办了MCLC电子邮件组。我接手杂志时就在寻找能够服务杂志读者的网上论坛。在此我可以发布有关杂志内容和学术会议的消息并推动讨论杂志上的文章。这一邮件组现有1500个成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学者、教师、研究生,但也有各行业的从业人员,比如服务于西方各大报纸和媒体的记者就有不少。我们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其中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和大中华区域为数最多。自1998年以来,我们已发出13000多条邮件,并生成了很多有趣的讨论“链条”,其中包括刘小波获诺贝尔奖事件(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以及顾彬(Wolfgang Kubin's)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看法等。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杂志、网站和电子邮件组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西方现代中国文化研究者集体身份感的成形。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西方中国学家与中国的研究者有更多的交流,也希望MCLC能在这方面贡献微薄的力量。

王:您在美国多个有关亚洲研究的专业学术研究协会中任职,你也一直和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保持着联络,您在近些年还指导了很多本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能否请您结合您的研究、交流谈谈您所观察到的中美两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状况、所存在的问题,或者给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

邓:我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已经20多年,其间也观察到这一领域的很多变化。正是我这一代学者首先将西方批评理论引入到中国文学研究中。夏志清等人受“新批评”影响,普实克(Jaroslav Prusek)受捷克“结构主义”影响,但他们的理论立场更多是隐含的而不是鲜明的。总体上说,理论的引入对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有正面促进作用,尽管“机械”套用、不质疑理论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适用度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我们或许并不同意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有关民族隐喻(national allegory)的提法或周蕾(Rey Chow)的某些观点,但他们在将中国文学从“中国研究”的小圈子带入与其他领域学者的对话这一方面,却比任何人都卓有贡献。尽管某些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式批评造成了对中国文学的非历史性解读,“文化研究”在上个十年的兴起却带来了在我看来相当正面的对历史主义的重新认识。在这方面最好的研究常常将对文本的创造性“细读”与对产生和阅读该文本的历史背景的深入研究结合在一起。

最后,尽管20年前中国与西方的中国学领域少有对话,现在的情况显然大非从前。中西学者常常在同一个国际会议上相见。西方学者更多地开始阅读引用中国学者的著作,反之亦然。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的发展也更为熟悉了。事实上,在西方工作的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往往比他们的西方同事更为理论化。这些都是正面的发展态势,但我也担心随着中西学者所阅读理论书籍和所持理论语言的日趋同

化,我们的研究有可能走向单一化。

我在研究中注重的問題之一是打破“传统”与“现代”的界限。五四一直被视为这二者之间的一条分水岭。所喜的是近来的研究表明这一分水岭已逐渐弱化;学者们已将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溯到晚清甚至更早;通常被视为“传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也已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合理部分;而用古文写就的现代诗也逐渐被认同为现代中国文学。这些都是正面的发展趋势。

王:我发现您近年来的研究发生了一个转向,您对现当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博物馆、纪念碑、革命圣地的历史、文化、政治内涵做了系列研究,您最近要出版的一部书也是与此相关的:*Exhibiting the Past: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useum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而且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文学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开阔的历史、政治文化领域。我看过您就这个话题发表的一些文章,也听了您在肯塔基大学所做的有关“烈士纪念馆和烈士陵园”的专题报告,请您介绍一下有关这个项目的研究主旨和您的主要观点。

邓:有关中国博物馆的研究对我而言是一次真正的突破。我以往的研究都是“文学性”的,都强调对文本的细读。与此相反,博物馆项目需要的是大不相同的研究方式,需要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各地做大量深入的田野调查。我访问了很多博物馆,采访了博物馆官员和馆员,并用照片纪录了我的行程。在研究方法上,这与去图书馆读书有天壤之别。尽管如此,我认为这本有关博物馆的书继续了我以前对文化体制的关注(如《中国民国时期的文学社团》一书),尽管博物馆与早期的文学社团不同,并与政权有直接的联系。这本书将包括有关革命历史博物馆、烈士纪念馆和纪念场所、文学博物馆、军事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等章节。我的目的是展示在“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后戒严”的台湾,“后殖民”的香港社会中博物馆领域的变迁。博物馆和纪念场所为讨论有关历史记忆、政治性重构过去、全球化及后社会主义社会中博物馆的职能转变,以及民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身份建构的问题提供了极为鲜明的公共空间。

以下是我2009年在台湾中兴大学介绍博物馆一书中文讲话的节录:

先让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这本书的内容。书里一共有12章,按照博物馆的种类来安排,包括:现代历史博物馆;文学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烈士纪念馆;个人纪念馆等等。还包括博物馆以外的一些具展示性的空间和建筑物(exhibitionary space),如:纪念碑,红色旅游和城市规划展览中心。书里不包括美术方面的博物馆。

除一章是关于古代历史博物馆以外,我的书写的都是现代历史博物馆。我之所以这样做有三个原因:(1)在国外,目前研究现代历史博物馆的人不多。(2)这些博物馆的内容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从研究方面来看很有意义。(3)我的老本行本来就是现当代文化与历史。

下面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研究方法。(1)我的基本研究方法大概可以说是“视觉文化法”(visual culture analysis):注重研究和分析博物馆陈列和布置。这包括(a)怎么样陈列照片,地图,画图,文物,文件等各种物件的;(b)怎样使用多媒体的(电脑,布景,音乐,声音等);(c)最后综合地来看,这些物件和陈列的方法和手段是怎样再现历史的。我也强调分析博物馆的建筑和设计 and 它们在城市景观的位置。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地处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所处的位置,显示了它特别的政治象征性和官方性。完全不同于“上海城市历史博物馆”,该馆设在“东方明珠”塔的底层。去过上海的人都知道,“东方明珠”位于浦东,与浦西的外滩相望。“东方明珠塔”象征着新的上海和未来的上海;把“上海历史博物馆”放在塔的下面意味着上海的历史为未来奠基。(2)第二个研究原则是分析博物馆的政治性,包括博物馆外面的设计和地处的位置以及博物馆里的陈列。我特别注意博物馆在所谓“后社会”时期的变化。我所用的“后社会”的意思是:在中国大陆的“后社会主义”,台湾的“后戒严”和香港的“后殖民”。因为在这20多年来,这三个地方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3)也许从上面的介绍,你们已经看得到,我也用“比较研究方法”。我比较研究的方法有三个方面:(a)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比;(b)中国、台湾、香港三地相比;(c)“大中华”和国外比。

王:您提到下一步将重新回归“纯文学”研究,要对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回家/还乡”主题进行探讨,您可否就您的思索透露一下您有关这方面部分的研究计划。

邓:在巴金《家》的结尾,高觉慧离家奔赴上海的场景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一,而与之相对的是吕纬甫回家的场景,像“蜂子或蝇子”一样绕了个圈子。早期现代文学中汗牛充栋的离家/归家意象促使我思考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他们的家、家庭和故乡的错综联系。在这个新课题中,我会关注从五四到当代文本中“家”的主题。尽管这一主题已被赋予充斥强烈情感的多层含义,“家”仍是考察现代经验的有力场所。在五四文本中(尤其是鲁迅和郁达夫的作品中),我关注到作者对故乡表面的排斥与故乡对作者的吸引力,由此反映出他们与中国传统本身的暧昧关系。该书的另一章将通过如冯沅君、冰心、白薇等五四女作家的文本来审视她们对“家”的“性别化”再现。因此,本书的第一部分将从中国20世纪早期(1915—1945)一系列文学形式中的“归家”意象来探究自我、性别、民族、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情结。该书的第二部分转入1949年之后,将有章节讨论毛时代“家”的“社会主义化”以及在后毛时代初期“家庭性”的回归,在全球化和市场改革的后现代时期“家”的稳定概念的缺失,等等。

王:除了您丰硕的研究成果以外,我发现您的教学经历也很吸引人,您为很多大学开设了多门有关中国文学、文化的课程,就我所知,美国的很多高校大学生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知识、甚至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都非常有限,你是怎样在美国大学课堂上讲授中国现代文学的?

邓:谈及教学,我们必须严格区分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我先谈本科生教学。一个西班牙语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两年之后就可以用原文阅读文学作品,但一个学中文的美国学生在学了两年之后却无法读鲁迅。简而言之,中文就是比一般语言更难。而要让我们本科生在四年毕业之前用中文阅读文学作品,的确很难。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是通过英文翻译来教中国文学。这显然不是理想的方式,但也绝不是有的人所谓用英文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解读。阅读翻译和阅读原文当然是不一样的,但不一样的阅读经验也能导向类似的阐释。我还应该提及的是我们本科生的情况近来已开始变化。他们中不少人到中国学习相当长的时间,因而他们中文水平提升的速度也加快了很多。随着学生中文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也逐渐开始在本科生文学课程中加入中文原文的阅读材料。

另一个有趣的变化是:近五年来在阅读英文翻译的本科中国文学课上出现了一大批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们都不是中文专业的,绝大多数来自工商、计算机等专业。他们选课的目的是满足我们所谓“综合教育要求”的学分。不少人因为自认是中国人,认为上中国现代文学课容易得“A”,所以选我们的课。我在2010年用英文翻译教中国现代文学入门课时,一半多的学生都来自中国,母语是中文。而十年前我的课上几乎就没有母语是中文的学生。因为学生构成的变化,我们的教学方法也在改变。这些学生对中国已有相当了解,尽管他们的中国历史知识常常是断裂的(对诸如反右、大跃进、文革的了解相当欠缺)。

在研究生方面,我们的情形也很奇特,因为绝大多数硕、博士生都来自中国大陆,他们是以中文为母语交流和阅读的,而且到我校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有中国最顶尖学府的中文系本科或研究生学历。不少人在开始到我校学习之前已掌握了有关中国文学传统的文本及语境的深厚知识。然而他们有时缺乏创造性阅读与阐释文本的能力,有时对什么才是原创性学术成果缺乏充分理解。他们有时还无法提出能使文本与研究领域中重要问题对话的新鲜论点。在研究生课程中,我们试图让学生在文学史方面打下扎实基础,但同时也强调与现有学术成果的对话,包括对理论在研究文学文本中如何有用又怎样无用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作者简介:王桂妹,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吉林 长春 130012。

罗 靓,美国肯塔基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何坤翁